

CIVIL OLD IMAGES NEW VISIONS SOCIETY

市民社会 旧形象 新观察

[美] 约翰·基恩 著
王令愉 魏国琳 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

责任编辑：郑西海
装帧设计：张晶灵
版式设计：李如琬

市民社会 旧形象，新观察

著者：[英]约翰·基恩
译者：玲 愉 魏国琳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
地址：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
邮编：200336
网址：www.ydbook.com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远东出版社
制版：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市印刷二厂
装订：张行装订厂
版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63 千字
印张：6.75
印数：1—3250

图字：09-2004-297 号

ISBN 7—80706—216—9/C·36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62347733）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零售、邮购电话：021-62347733-5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民社会:旧形象,新观察/(英)基恩著;王令愉,魏国琳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

ISBN 7-80706-216-9

I. 市... II. ①基...②王...③魏... III. 市民—城市社会学 IV. 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8136 号

序

探索“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

童世骏

“市民社会”，就像“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一样，在我国，甚至可以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思潮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很长时期内被看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在许多人心目中，在这些词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有点像在“铁”前面加上“木制的”这个定语，在“圆”前面加上“方形的”这个定语，只会是一种用词矛盾，一种逻辑错误。

但到了 20 世纪末新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样的提法在我国已经不仅被学术界广泛接受，而且也进入了官方的正式文件和发展纲领。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必须是法治国家，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全民的共识。

相比之下，“社会主义”与“市民社会”的结合似乎还没有被正式承认；“社会主义市民社会”这个观念似乎还没有取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两个观念同样的地位。

这不难理解。“市民社会”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 civil society，它译成法语的 bourgeois société 和德语的 bürgerlich Gesellschaft，都有“资产阶级社会”的含义。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当

中，市民社会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体制，市民社会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含义就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这确实让人感觉自相矛盾。

但从另外方面来说，“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应该是比“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更顺理成章。根据英国左翼历史学家豪布斯邦的研究，“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这两个词仅仅是从“社会的”这个词派生而来的，其意思不过是表示人类天生就是一种社会的、善于结成社会联系的存在。换句话说，因为“社会”是与“个人”相对的，所以“社会主义”的对立面从一开始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之所以变成反资本主义的，仅仅是因为在19世纪初，说个人主义社会的核心是竞争（也就是市场），因而社会（主义的）社会的基础必须是互助或团结，是再合乎逻辑不过的事情了。”^①由于这个缘故，19世纪相当长时期的相当多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的途径可以有多种多样；与“共产主义”不同，“社会主义”不一定同政权问题相联系：“它可以用国家来实行，也可以用任何其他种类的有效权威来实行，但在多数情况下，它可以由志愿性社团——通过肖伯纳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社会主义’——来建立。”^②只是到了追随雅各宾派民主传统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工人运动选择了集体性政治行动之后，社会主义才同夺取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从那以后，国家自然就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核心成分。”^③于是，“社会”主义可以说变成了“国家”主义。所

① Eric Hobsbawm: "Out of the Ashes", 刊于 Robin Blackburn (ed.): *After the Fall: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Verso, London/New York, 1991.

② 同上。

③ 同上。

谓“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观念，无非是要让社会主义从“国家”主义重新成为“社会”主义。

对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兴趣，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学术界，也有明显的体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市民社会”成为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中国当代学术界对市民社会的讨论确实与国际范围的对于市民社会的兴趣有关；对这个国际现象，王令愉先生翻译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基恩的《市民社会：旧形象，新观察》一书有详细而生动的描绘。基恩的著作没有提到的是，德国思想家尤根·哈贝马斯早在 1962 年就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一书在 1989 年才出版英译本，与世界范围的对市民社会的兴趣恰好重合，使得该书不仅在英语世界立刻受到关注，也引起密切关注英美思想界动态的中国学界的兴趣。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对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受到的西方影响，比较多的是新自由主义一路的；而来自左翼的西方影响，则主要是哈贝马斯一路的。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法进展到国家/经济/社会三分法，把“市民社会”“理解为一个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互动领域，构成这个领域的首先是亲密领域（尤其是家庭），结社领域（尤其是自愿结社），社会运动，以及各种形式的公共交往。”^①

在这种情况下，基恩的这本著作在中国学术界的作用之一，是提醒我们注意，对市民社会的左翼兴趣，还存在着另外类型的。事实上，约翰·基恩可以说是最早主张并详细论证“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观念的左翼思想家。在 1984 年出版的《公共生活和晚期资本主义》（该书中文版出版于 1992 年）一书中，基恩

① Jean Cohen, Andrew Arato,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Theory*,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1992, ix.

批判这样两种观点:把民主化等同于把国家权力扩展到国家以外的市民社会领域的观点,以及把民主化等同于废除国家、在市民社会的公民之间建立自发协议的观点。在他看来,“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之路”介于这样两个不可性的极端之间。在1988年出版的《民主与市民社会》一书中,基恩强调“多元的民主公共领域的观念、市民社会于国家之间的区别,仍然是具有核心意义的。”^①

与哈贝马斯以及受哈贝马斯影响的一些左翼思想家不同的是,在基恩所理解的“市民社会”概念中,仍然包括自由主义市民社会理论所包括的经济领域:“一种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理论……必须更多地考虑它在生产、交换和消费方面的主要的组织原则。”^②基恩反对哈贝马斯等人把经济领域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认为这种观点一方面使市民社会处于经济上被动消极的地位,被剥夺了任何使它能捍卫或加强其力量的财产资源,另一方面使市民社会中的物质生活被贬低为仅仅是用于实现市民社会所追求之目标的手段,而没有任何内在的自由的价值。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基恩再次强调:更多的民主是1989年以后对左派进行成功的重新定义的关键,而更多的民主则要求“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分立;也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多层次的(跨国家的)国家,这种国家时时对一个多元主义的、自我组织的(国际性)市民社会负责,并且建立在国家建制和社会建制之间进行公开中介的种种机制——政党、议会、传播媒介和法团主义程序。”^③

① 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Verso, London/New York, 1988, xiii.

② 同上。

③ 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the Idea of the Left”, 刊于: David McLellan and Sean Sayers: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Macmillan, London, 1991, 8.

上述观点,基恩在本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发展。对市民社会有理论兴趣的读者,对探索“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的可能性有理论兴趣和实践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得到丰富的信息和启发。

2004年7月8日

作者介绍

仅仅10年以前,区分18世纪“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件事还显得迂腐,是被冷嘲热讽、甚至攻击的对象。在这部新著作中,约翰·基恩说明了在一个截然相反的环境下,这个古老话题怎样重新在政界、学术界、新闻界、商界、慈善机构和市民组织中变得流行起来。

约翰·基恩回顾了“市民社会”一词戏剧般地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各种原因和阶段。他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探讨它的再现——从中国到突尼斯,从南非到正在形成中的欧洲联盟;分析“市民社会”一词容易引起争议的内涵。作者尤其注意解释“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不同含义。约翰·基恩通过证明市民社会前景尚不明朗,把读者带入了以前未知的思想领域,即:对市民社会建立一个全新的设想是完全可能的,这将改变人们对权力、财产、暴力、政治、宣传、民主等事物的看法。

约翰·基恩的这部著作独树一帜、想像丰富,对政治学、传媒学、社会学、社会与政治理论学科的学生、学者、以及关心政治研讨与发展趋势的人们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约翰·基恩是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并兼任民主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民主与市民社会》(1988)、《传媒与民主》(1991)、获奖传记文学《汤姆·潘恩:政治生涯》(1995)、《对暴力的反思》(1996)等。伦敦《泰晤士报》称他为“英国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具有世界影响”。

前 言

1997年2月,此书尚在写作过程中。我收到一位同事寄自贝尔格莱德的挂号邮件。它用一根包装绳捆扎着,已经破旧不堪,里边塞满了剪报、张贴画、明信片和图片,还附有一封短信。这封信讲述了戏剧性的、如今已轰动世界的塞尔维亚事件最初几个月的情况。“你真应该来这儿,亲眼看看过去72天中发生的平时不可多见的奇事”,“每天晚上,在受国家控制的电视新闻节目时段内,成千上万的人们采取制造噪音这一‘流行’方式表达他们的呼声。他们猛地打开窗户,敲打瓶瓶罐罐或是同时按汽车喇叭,聚集到大街上吹笛子、单簧管和喇叭。新闻节目一结束,喧哗也会立即停止。随后许多人成群结队步行穿过贝尔格莱德市已被戒严的街道。警戒线阻止不住他们,因为学生们组成了‘反警戒线的警戒线’,更何况游行的人数与日俱增。”

“游行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封信接着说,“它象征着我们要求生存空间,象征着我们新型的公民自由。游行路线和聚会地点通常通过移动电话协调决定。我们走到任何我们能去的地方:绕过宗教大学校长的庭院,经过教育部和《政治报》的编辑部,转过充斥着鸡蛋破碎声的塞尔维亚电视台的房子。有时这些游行的人们围成圆圈,像监狱里的囚犯们那样绕着圈行走。这儿的天气异常寒冷,气温在零下10摄氏度甚至更低。同情者

为这些游行者们送来食物、茶和咖啡。学生组织禁止任何人喝酒。在共和广场曾有过几次规模浩大的示威活动,到处是鲜花、口哨、布告、旗帜、欢呼的儿童、乐手、演员;人们跳着,唱着爱国歌曲。示威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生活在巴尔干。关于民族主义和战争、无法可依和贫穷化,他们有着许许多多的话要说。然而,他们也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家庭、文化和教育中,宽容、直率和自立型的性格培养是经久不变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戏剧性事件之后,总统麦克贝思及夫人一直保持缄默、不曾露面。他们肯定嗅到了一种他们无法容忍的气息:一个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国度。”

1997年9月,这部书即将完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博士在一次会议上发表演说,宣传他们国家的多媒体走廊(MSC)^①。它从马来西亚新国际机场向北延伸到吉隆坡,如今由高耸入云的巴多拿(Petronas)双塔向外发射信号,辐射50公里长、15公里宽的地带。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将来会积极发展建立在数字通讯技术基础上的新兴产业,马哈蒂尔总理如是解释。他描述了多媒体走廊将怎样向前来投资的外商提供便利,使他们能够通过电子贸易跨国经营,发展与全球IT领袖的灵活伙伴关系,以及让资本增加的企业上因特网。MSC将包括一座智慧之城赛博查亚(Cyberjaya)和一个新兴的“网络化的”联邦首都布特拉查亚(Putrajaya)。首座极其先进的建筑“赛博观测站(Cyberview)”已经建成,多媒体大学的工程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40多家马来西亚企业及外国企业对上述项目给

① “创建我们共同的未来”,1997年9月16日,马哈蒂尔·本·穆罕默德博士在马来西亚的塞里·肯班举行的1997年亚洲多媒体会议与展览(MMA'97)上的演说。

予了高度评价,其中包括美国庞大的微软公司,它的创建人比尔·盖茨是 MSC 的国际顾问小组成员之一。

马哈蒂尔总理指出, MSC 是他的 2020 年更大规模的总体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演说中,他宣告要通过建立“电子化政府”,领导国家进入信息时代。优先考虑“无纸化政府办公室”和“政府自动化采购系统”。电子化政府将意味着为公民提供更透明、更高效、更广泛的服务,例如发展服务窗口。通过这些窗口,人们可以在商业区的电话亭或是在家里用个人电脑更换驾驶执照、交电费。电子化政府将成为一个廉洁的政府。马哈蒂尔总理预言:“政府支出将减少,私人企业将涉足基础设施建设。”他还说,多媒体走廊将首先在社会领域产生深远影响。MSC 不仅有助于开创新型的服务和产品,例如世界上第一台被称为“e-pass”的多功能电脑,其尺寸只有钱包大小。马来西亚利用信息技术转型为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这将深深影响每一个马来西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希望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发达国家,”马哈蒂尔总理总结道。马来西亚的 IT 计划确定其发展模式的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指的是一个自我调节的社会,它通过使用知识、技巧以及人民的价值观念进行管理。这样的社会将使得每一个马来西亚人都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不仅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目 录

前言	1
权力	1
全球趋势	9
区别	26
争议	56
民族主义	70
非市民的社会	103
宣传	144
结尾	172
译名对照表	176

权力

来

自贝尔格莱德的私人信函中所描述的政治事件，与遥远的新兴工业国那位政界要人的演说之间，看上去似乎毫不相干，只有四个字除外：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在当代社会如此流行，巧合也就很有意义、不足为奇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市民社会这个说法实际上已经从思想界和政治界消失。直到最近十几年，“市民社会”这个词听起来还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不合时宜，甚至在某些圈子内遭到挖苦和敌视。然而，随后“市民社会”这个说法却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文学科领域内变得时髦起来，非常频繁地从政治家、工商业巨头、学者、基金会经理、社会救济部门和公民们的唇齿间吐出，以至于以公正著称的《泰晤士文学》副刊都为其正名，注意到“这个词正变成 90 年代的主旋律”^①。

我的研究集中在市民社会本身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将产生

①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第 4940 期（1997 年 12 月 5 日），第 30 页。

哪些影响的课题上,试图向对整个市民社会的发展惊讶不已并困惑不解的观察家们描述并解释其概貌,因为他们要么生活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直至今天,那里从未出现过类似于“市民社会”的词语;要么生活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与市民社会实质相同的词语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然而,他们在公民结社能力下降并由此引发政治危险这个问题上看法却比较一致——他们倾向于如同滚保龄球那样放任自由,思想界与政治界以“公有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自嘲。我所做的有关市民社会的课题是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构思的,开始于恢复 20 世纪马克斯·韦伯时代流传下来的德国政治思想中公共领域观念的尝试性研究^①。这项研究受到几个可资征引的事物的启发。如地下大学、捷克斯洛伐克公民的首创精神、行将崩溃的福利国家计划以及起草并颁布《七七宪章》的工作(这是市民们的首创,公开为大不列颠呼吁一部成文宪法),引发了我的公开承诺和思想政治论战。“市民社会与国家”这个研究课题的成果终于在 1988 年出版,并于 10 年后再版。这项成果的两卷著作题目分别为《民主与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与国家:新欧洲展望》^②。这两本书旨在激起对曾经时髦过的话题进行新一轮讨论,赋予它新的理论意义和政治含义。这两本书提出了时至今日仍能引起反响的问题:最初 18 世纪国家与市民社会王国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确切来说是指什么?为什么这个在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至关重要的区别随后似乎不留痕迹地消失,却再一次成为尖锐议题?区分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及政治目的何在?它是为哪个阶层的思想和政治利益服务的呢?

① 《公共生活与后资本主义》(剑桥和纽约,1984)。

② 《民主与市民社会 关于欧洲社会主义的困境、民主的前景以及控制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问题》(伦敦和纽约,1988;伦敦,1998);《市民社会与国家:新欧洲展望》(伦敦和纽约,1988;伦敦,1998)。

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使我思维模糊,《民主与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与国家》在它们所属的领域内渐渐被我认为“经典之作”。静下心来思考这两本书是值得的,因为它们所包含的“旧形象”有助于今天的我们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新视角”,而市民社会可以也应该在即将到来的几年中得到发展。《民主与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与国家》回顾了18世纪末期欧洲区分“市民社会”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的渊源,以及它们在19世纪初期的发展情况,告诉人们,“市民社会”(societas civilis)传统上是指一种法治的、和平的政治秩序,现在却是指与领土意义上的国家原则在制度上相区别的生活领域。这两本书强调了从1750年至1850年,“市民社会”一词尚无定义,而且多变,乃至成为激烈的讨论和争辩的题目。从美国革命时期起,人们就对它争论不休,许多作者稀里糊涂地使用“市民社会”一词,谈论颇为活跃且相互联系的非政府机构,如市场经济、家庭、慈善团体、俱乐部、志愿者组织、独立教堂和出版社等。我的两本书致力于在近代对“市民社会”的理解的基础上履行重建理论的使命。当我使用“市民社会”一词的时候,指的是一种理想的、典型的社会形式,描述、展望了受到合法保护的、既复杂又生机勃勃的非政府机构。它们倾向于非暴力、自治、自省,并与“陷害”、压制、左右他们活动的国家机构关系紧张。

《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民主与市民社会》试图说明,“市民社会”一词在分析已经发生的事件,如专制国家遍布世界、出现了把妇女排除于公共事务之外的新形式、欧洲生活方式“文明化”等现象时,是非常有用的。两书的重点放在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机构之间过去曾流行的理论区别、人们对重新评价当代社会与政治发展的接受能力上。例如,《民主与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与国家》告诉人们,“布拉格之春”以后,为什么极权政体的抵抗组织经常谈论“市民社会”。但是这两本书坚持认为,区分国家

与市民社会不仅仅在缺乏基本政治和社会自由的背景下至关重要；“市民社会”一词同样适用于福利国家走下坡路、新自由主义抬头和社会运动增多等许多政治现象。通过这种方式，这两本书都希望并试图打消长期占据人们心头的疑虑。例如，认为市民社会前途已被 20 世纪末期的一系列事件压倒；市民社会观念或许在对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分析过程中、在为反对专制主义进行政治动员的计划中确实有用，但是在筹划如何组织“后现代”民主体制并采取建设性行动时，实际作用已经不明显了。

* * *

针对“市民社会”一词已经过时的偏见和猜疑，书中列举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关于“市民社会”的争论范围很广，其中包括：市民社会对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免于暴力的优待；主张允许社会团体和个人在法律范围内自由表达自己对社会的看法的重要性；离开各种不受国家控制的传媒和通讯自由不可能实现（这个问题在下文中还会深入探讨）；坚持市场的政治调控和社会约束是消除不能执行当前效率标准的生产因素的上策。然而，这两本书的焦点都集中在民主问题上，更确切地说，是出于思想和政治的需要而唤醒人们对民主的向往。这两本书通过驳斥市民社会是“过时观念”的说法，力求一改传统、富有建设性地思考现代民主传统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动乱、战争、极权主义和福利国家至上之后，能够新生并在全球走向繁荣。这两本书认为民主是政治体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包含着市民社会和国家机器，它们彼此独立又互相邻近、各具特色又互相依存，发挥作用。在这个体制内，无论是在家庭、公司会议室，还是在政府办公室，都得经过公共讨论、协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后，权力才能得到实施。